

陈云的粮食安全思想和主张

□ 赵纪萍

“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

陈云领导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次粮食危机，深刻了解粮食储备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他提出“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强调“国家必须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没有粮食储备的情形是很危险的”。

一方面，陈云高度关注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我国人多地少、粮食生产率不高，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缺口增大，粮食紧张问题突出，成为经济建设的制约因素。对此，陈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随时关注国家粮食安全形势，居安思危谋划粮食安全。1955年2月，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指出“粮食形势从现在开始起，至少还要紧张十年”，客观分析粮食紧张对农业农村工作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1959年4月，陈云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再次提醒，“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1961年1月，陈云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现在，粮食供应是紧张的”，从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原因，并提出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

另一方面，陈云强调粮食储备对于粮食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他客观分析中国在粮食储备方面的缺口，指出“我们没有任何粮食储备，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1951年5月，陈云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储粮备荒备战的思想：“我常常想，我们在粮食方面要做一点保险工作”“为了应付水旱灾害，要注意储备粮食”。1961年5月，他在外贸专业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从外贸工作的角度强调粮食储备对于粮食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

“用什么办法使农业增产呢？”

“全党重视粮食工作”

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粮食问题至关重要。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者，陈云历来重视粮食工作，提出“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重视粮食工作”。

陈云十分注重从农业生产的重要地位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他提出“粮食问题也就是农业问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认为重视粮食工作就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不仅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而且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1955年3月，他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客观分析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工业产品又占目前国家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绝大部分也是农产品出口换来的。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

另外，陈云从民生的角度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出“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在“吃的方面，先粮食后副食品”，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当作首要责任，予以高度重视。早在1949年8月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就指出，“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1956年11月，他在商业部扩大部的会议上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商业部必须高度重视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他站在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要求必须保障人民吃饭问题。

陈云还从政治方面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陈云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立足国情提出实现国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必须首先解决粮食问题。1957年9月，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针对全国粮食供给紧张的情况进一步强调“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的工作”。他指出，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市场是否稳定取决于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如果市场物价不稳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因此，“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1985年9月，陈云再次强调，“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粮食安全事关政治稳定、国家安危，陈云一再提醒全党必须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四保临江纪念碑坐落在吉林省白山市北山公园内。纪念碑平面布局采用三大块面，利用不同高差的台阶，代表“三下江南”。碑身用象征四面红旗的旗塔组雕而成，代表“四保临江”；主旗为1947米，象征着1947年第四次保卫临江战役的胜利。碑体正面为陈云题写的“人民烈士浩气长存”，背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四六年冬，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凭借美式装备优势，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集中十万兵力向我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妄图占领全东北。当时，南满根据地仅剩临江、长白、抚松、靖宇四县，我军三、四纵队及南满党政机关团体撤至临江，形势十分严峻。

在强敌压境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陈云和肖劲光同志来临江，组成以陈云为书记的南满分局，以肖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委的辽东军区。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七道江村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确定了“坚持南满，保卫北满”的战略方针。

我南满部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支援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历时一百零八天，打退敌人四次进攻，歼敌四万余人，我军伤亡两万余人。“四保临江”战役的伟大胜利，打破了敌人独占东北的企图，巩固、扩大了以临江为中心的长白山根据地，迎来东北解放的曙光，在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在纪念“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浑江市人民政府和各族各界人民捐资建造此碑，缅怀先烈，教育后人，永志青史。
四保临江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浑江市人民政府敬立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

近500字的碑文概述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背景、经过及意义，充分表达了后人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

人民烈士浩气长存——四保临江纪念碑碑文敬读

□ 张士文 赵 颖

关键的拍板

抗战胜利后，东北因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1946年10月，国民党军为实现“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调集10万兵力进攻南满根据地，企图先占领南满，再全力进攻北满。

在此紧急形势下，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陈云、肖劲光到南满主持工作。12月11日至14日，辽东军区在七道江前线指挥所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前期对南满去留问题产生了争论，多数人主张放弃南满北上。14日，陈云主持会议，在反复与大家交流看法后，循循善诱地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是朝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坚持南满，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陈云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要在长白山上插红旗，摇旗呐喊！如果这个决定下错了，责任由我来负，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陈云的讲话统一了大家的思想。40多年后肖劲光高度评价：“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这是陈云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

“牵住牛尾巴”

1946年12月17日，我军四纵按照既定部署，跳出敌人封锁圈，在安（东）沈（阳）路两侧，发动外线作战。经过10天激战迫使敌进攻临江的2个师回援。正面作战的三纵，抓住战机，在通（化）辑（安）线上实施反击作战，歼敌1700余人。四纵挺进敌后，歼敌2300余人。为策应南满作战，北满部队于1947年1月5日越过松花江。一下江南，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向长春、永吉以北的国民党军发起进

攻，肃清了农安、九台以北和德惠以东之敌，切断了吉长路、中长路，迫使从南满抽调4个师北援，有力地支援了南满的防御作战。1月20日，一保临江胜利结束。

1月30日，敌集中4个师兵力，分三路再犯临江。针对敌位于高丽城子的1个师孤军深入，我军三纵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歼，歼敌2000余人。随后我军挥师三源浦，一举消灭增援的敌1个师近2000人。

2月中旬，敌出动5个师三犯临江。我军首先打敌侧翼暴露的师，然后将敌另一个师拦腰斩断并击其侧后，歼敌1个团又3个营，迫使敌弃辑安。此战，四纵第十师师长杜光华壮烈牺牲。其间，北满部队发起二下江南作战，围攻德惠，调动敌2个军兵力。南满部队乘胜作战，连续收复辑安、金川、柳河、辉南、桓仁5座县城。在北满部队北撤休整时，国民党军集中2个军兵力，大举北进，企图与北满部队决战于松花江两岸。北满部队立即反击，于3月8日三下江南，至3月16日，共歼敌7000余人。

3月27日，国民党军集结20个团的兵力，妄图趁北满部队不能渡江策应之隙，向临江发动第四次进攻。在这紧要关头，陈云等当机立断，以准备“打几个恶仗、硬仗、较冒险仗”，不惜付出损失我军2/3或3/4的代价打胜这一仗。我军集中优势兵力，于4月3日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国民党军最后一次进攻临江彻底失败。

胜利的丰碑

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犯企图，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指战员革命必胜的信心，扭转了南满和整个东北战局。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随后乘胜



发动夏、秋、冬三季攻势，为辽沈战役和东北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一切为了大局的胜利。面对东北复杂的形势，陈云临危请缨，主动要求去南满。他指出：南满“为东北重要的侧翼战略阵地。”他要求广大官兵都要明白“南满作战总的说是牵制战，牺牲是一定会有的。但局部牺牲是为了保住整体，使战略地位不至丢弃。”

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奋斗的结果。广大指战员爬冰卧雪，不怕牺牲，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多次穿越敌人炮火封锁为部队运送给养，护理伤员，安排宿营。军民团结奋战，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取得的。在党中央、东北局领导下，北满、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在对敌作战中形成两个战场相互支撑与配合的格局，有力地改变了敌我战略态势。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革命到老学习到老的林伯渠

□ 尧 凡

解。“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成功者，毅力之结果耳。”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第二是“力去骄惰”。在他看来，骄、惰二字误人最甚，“怠惰如绵，其衰弱身体，速于劳动”。因此他认为不论是学习、用兵与做人，骄和惰都是万万要避免的。

林伯渠手不释卷，有一点空就学习，有时边吃饭边看书。习仲勋回忆道：“不管是在陕北窑洞里，还是在行军途中，他总是尽可能挤出时间学习，思考和钻研理论问题。”1955年在与临澧县县委成员座谈时他曾指出：“要革命就要好好学习，绝不能借口工作忙而忽视学习，不好好学习就要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在他已经70多岁时，他眼睛已经不太好，但仍然坚持每天六点就起床学习至少两个小时；如果不去检查工作，每天甚至要学习十个小时。

“智识愈多，愈觉学问不足”

林伯渠深知“智识愈多，愈觉学问不足”，所以他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学习研究各领域知识。在留学期间，他攻读经济学和法学，不仅对财政学和统计学等广泛研究，而且对民法、刑法、国际公法和行政法等也很感兴趣。林伯渠酷爱读书，读书的范围也很广泛，可谓古今中外样样皆读。在青年时期他广泛阅读各类进步杂志，并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充分思考。无论是儒家、道家等经典著作，还是各类历史名家的著作，他都进行

专门的阅读和学习。读书是林伯渠一生的事业，时任富县县委书记的谢怀德回忆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期间时曾提到：每次看见他时，他手里总是拿着书，并且常常读书到深夜。

林伯渠读书有自己的方法。读书时遇上好的段落或词句，他都会摘抄下来，进行反复的学习，甚至在他的日记中能看到他摘抄的名人名言。对于经典著作，他经常将几本书放在一起，对照着阅读和研究。在学习日语和英语时，他常先去青年会听日语和英语的演讲和专题讲话，尽量多读日文书和英文书。为了巩固学习成果，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外语水平，他还从事外语的翻译工作，如翻译书刊和报纸上的文章，一天往往翻译数千字。在苏联学习期间，他由于年纪大被分在特别班，但学习十分用功。为了能听懂老师上课以及阅读马列原著，40多岁的他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他离开学校为止，俄语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

“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

陈毅评价林伯渠：“革命一生无愧作，路线正确是英雄。”林伯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思想也正是在读书学习和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少年时期，林伯渠由于深受康梁改良思潮的影响，把希望寄托在“君主立宪”上。他在自传中曾写道，正是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中维新立宪学说的影响，加上他本人从日译的欧美书报中了解的有关民主政体的概念，使他加深了对革命

生活的认识。但当他读了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后，思想就与改良主义完全决裂。在求学时期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后，他决心立志为振兴中华民族干一番事业，并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不惜抛弃名誉和地位，作出了义无反顾的政治抉择，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走在一起。他在自传中评价自己：“回忆过去，自己庆幸着此生并未虚度，生活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意义，瞻望将来，自己怀着从来没有过的信心与勇气，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前进。”他的一生，是在不断的学习中最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在坚定这一立场观点方法后不断学习和巩固。他为自己所写的《六十自寿》中“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这两句诗，深刻揭示了他坚持走过漫长革命道路的力量。同时，他还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表现”。在他60岁诞辰前夕，还曾向毛泽东请教：“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多做工作”。这表明他已经牢牢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党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刻保持革命和学习的精神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永远保持学习和前进的精神，以及坚定的政治信仰，成就了他革命的一生。

